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93期(民國105年9月),143-149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Yukiko Koshiro, *Imperial Eclipse: Japan's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Continental Asia before August 1945*

Ithaca, New York; London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2013. 311pp.

蘇聖雄*

一

作者小代有希子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,治國際關係史,長期在美國的大學任教,現任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。其於 1999 年出版的《跨太平洋的種族主義與美國對日佔領》〔*Trans-Pacific Racisms and the U.S. Occupation of Japan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9), 修改自其博士論文〕一書,獲日本大平正芳紀念獎,論者肯定該書將對亞太、日美關係發生重要影響。

作者的研究範疇原未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,直到在美教學,常有學生詢問相關史事,使其不得不展開相關研究,於是鑽研愈深,獲世界各地許多研究機構之助,擴大了視野。於《美國歷史評論》(*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)及《外交史》(*Diplomatic History*)等期刊發表專題論文之後,其將相關研究發展爲本書。

二

《帝國的銷蝕:日本關於亞洲大陸的戰略思考(1945 年 8 月以前)》一書

*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

分四個部份，各部份或有 1 至 3 章，全書共 8 章，另有前言、後記。第一部份講述戰前日本對俄國之認識及關係，提到俄國與日本交流甚早，起先是日本船難者帶給俄國關於日本的知識，俄國且是第一個與日本進行港口貿易的國家，與美國培里（Matthew C. Perry）幾乎同時。其後沙皇腐敗，才使日人對俄國失去興趣，開始重視英、美。不過，日本社會仍有不少社會主義者受馬列主義影響，多人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；農民、工人甚至知識分子，且受共產主義之影響而批判日本政府。1925 年日本承認蘇聯主權，政府建立日露協會，設置日露協會學校，加強雙方交流；該會成員，皆有相當社會地位，如其後出任參謀總長的閑院宮載仁親王。蘇聯文化對日本文學、藝術等影響亦大，相對而言，日人對美國的印象較為模糊且片斷，戰前大部份的日本人，與西方也缺乏交流（頁 15-44）。

就文化與種族言之，戰前，日人覺得自己屬於歐亞大陸的範疇，藉由西伯利亞鐵路到莫斯科或柏林，比藉船運到紐約或華盛頓要快。俄人較不歧視異民族，可以說是屬於亞洲的，而非白人的。相較之下，美國歧視日本人，限制日人入境，因為日人非白人。美人在日旅居者亦十分孤立，與其他日人分開居住，自身帶有優越感，不與日人通婚，職業集中於傳教士和教師，極少勞工。俄國人則與在日美人大不相同，其第一波移民為 1917 年至 1923 年，主要是中產階級或貴族；第二波移民為 1923 年至 1945 年，主要是農民、小販等普通人。因此，在日俄人含括不同社會階層，帶來俄式音樂、戲劇、食物，也較為謙虛，生活多樣，大多做小販，販賣羅紗等，甚至出了一些著名的運動職業選手，如職業棒球讀賣巨人隊的須田博（Victor Starffin）。日人融合俄國文化，創造泛亞洲主義，滿州國便是此一情態之展現，該國強調國際性、種族和諧，融合滿人、漢人、蒙人、朝鮮人、日本人及俄人（頁 45-80）。

日本雖於 1936 年加入反共協定反對共產主義，惟日本實亦需對抗資本主義列強，乃欲藉蘇聯制衡美國，將蘇聯作為美國進入亞洲的緩衝，避免日本推動的泛亞洲主義遭到美國干涉，此即為 1941 年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重

要背景。而此前在 1940 年日、德、義簽訂的三國同盟條約，是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前奏，日本想要以日、蘇、德、義來對抗英、美在亞洲的勢力，也可以說是聯合德、蘇等「新帝國主義」去對抗英、美的「舊帝國主義」。戰爭末期，蘇聯進攻日本帝國（頁 81），使後人忘卻蘇、日間人民和文化的交流及政治的聯繫，日本失去與歐亞世界的連結。

第二部份講述日本思索帝國瓦解之後的東亞未來，尤其將討論聚焦於中國和朝鮮。作者指出，中日戰爭的研究，包含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勝利及日本於外交失利兩部份，但這樣關注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研究，限縮了對此一戰爭的理解。作者強調，應加強日本當時對中共認識之研究（頁 85-86）。她指出，當時日軍對中共的評價極高，認爲中共優於國民黨，可以改變中國，並預料中共將在最終的內戰中獲得勝利。1944 年年中，日本調整對中共的策略；年底，且有意承認中共政權，對蘇和解，加強日蘇互不侵犯條約。作者引用學者明石陽至的說法，指出日本政府試圖讓中共領導中國，結成莫斯科——延安——東京陣線，反制國民黨——華盛頓同盟。作者復提出，當時日本認爲中共非蘇聯跟班，中共革命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，日方期望毛澤東有力量抑制美、蘇，使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，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，意圖藉中共營造勢力均衡，戰後由中共進行亞洲型態的復甦和發展（頁 86-87、121-123）。

談到朝鮮，作者指出該地提供日本工業產出、食物、軍械，其鐵路且可聯結日本到中國。日本推動「內鮮一體」（內地日本與朝鮮一體），欲同化朝鮮人，但並不成功，朝鮮人在海外建立臨時政府、光復軍，反對日本殖民統治。當巴黎和會威爾遜主義破滅，朝鮮人轉向反帝、反殖民的蘇聯，朝鮮的共產黨徒大幅增長，使日本的朝鮮軍對此現象進行深入研究。戰爭末期，日本情勢不佳，蘇聯、國民黨、中共皆支持朝鮮人反日，日本注意戰後各勢力對朝鮮的影響，希望美、蘇在朝勢力均衡，不希望任一勢力單獨在朝建立霸權（頁 124-150）。

第三部份講述日本在戰爭結束及其後之歷程，指出日本戰爭計劃者外相重光葵、駐蘇聯使館外交官守島武郎等，皆不斷構思如何面對戰爭終結、如何能

維續日本霸權。日本有意運作蘇聯自英、美陣營分裂出來，於戰爭末期，對於蘇聯可能撕毀互不侵犯條約，早有預期，因此思考各種可能狀況，意圖對蘇讓步，防止蘇聯加入戰爭（頁 153-163）。另一群人，如駐瑞典武官小野寺信等，嘗試推動對美和平，這些「和平仲介者」希望發展資本主義，其立場接近 1920 年代的華盛頓體系，希望日本戰後能保留朝鮮、臺灣（頁 163-169）。日本戰爭計劃者不基於意識形態，僅希望其敵對勢力美、蘇能保持平衡，並未如表面宣稱的要戰到一兵一卒，本土決戰並非日本唯一選擇（頁 171）。

過去依據日本外務省官方歷史的說法，指出波茨坦宣言發表後，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原在討論該宣言是否要日本「無條件」投降，最後在軍方壓力之下，才公開表示對此宣言不理會（默殺，Mokusatsu, 頁 225-227）。作者修正這個說法，提出日本的反應，不可說是不了解事態的急迫性而不理會波茨坦宣言，而是他們認爲該宣言是美國單方面的、排除蘇聯的參與，才會如此冷淡應對。戰爭末期，日本規劃故意讓蘇聯在日本控制區內擴張，順從蘇聯的要求，在蘇聯參戰前，不可投降，讓蘇聯於亞洲坐大以制美國。其後美國投下原子彈，並未使日本決策者決定投降，而是持續與蘇聯談判，直至蘇聯參戰之後，日本才召開戰爭最高指導會議，討論投降事宜，因此，美國原子彈對日本投降影響不大；日本決定投降的關鍵，非原子彈，而是蘇聯。是以，要人近衛文麿得知蘇聯參戰時，反認爲這是上帝送的禮物。日本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對駐外使節的電報，都沒有提到原子彈的作用，而是說透過蘇聯達到和平的方式失敗，是促使日本投降的因素。昭和天皇雖然說原子彈使他傾向結束戰爭，但政府領袖對此看法並不一致（頁 227-253）。

第四部份談日本戰爭記憶與書寫的問題，指出戰後一段時間，日人仍在思考美、蘇間的位置，並非馬上倒向美國，戰時反帝的社會主義思潮反而應勢興起。作者再度強調，原子彈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那麼重要，當時日人雖害怕原子彈的殺傷力，但該武器不必然促使日本立刻投降美國。蘇聯參戰雖未如原子彈造成大規模毀滅，但於日本之歐亞戰略產生重大影響，對日人心理上、情感

上、知識上有極大震撼。為求戰後生存，日本天皇等政府領導者希望美、蘇勢力均衡，使日本能在夾縫中生存，因此刻意讓參戰後的蘇聯在日本帝國內擴張，使蘇聯在亞洲獲得更大影響力，能與美國抗衡。直到美國單獨佔領日本，日本於美蘇冷戰局勢中倒向美國一方，形成美日同盟，遂遮掩了蘇聯在戰爭中的角色，戰爭過程中歐亞交涉的層面，開始從日本歷史和記憶中遠去。戰後留下的大陸殖民地及佔領區，交由美、蘇處理，日本也免除了一切責任（頁257-268）。

要之，作者認為日本的戰後歷史書寫，受到美國佔領影響，以「太平洋戰爭」的脈絡作敘述，此一論述，使人們以為在戰爭末期，所有日本人皆知道將單獨敗於美國，且日本戰後將進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。如此，忽略了日本在中國的戰爭及日本殖民帝國的戰略和崩解過程，尤其忽視了蘇聯的作用（頁 257、272）。

三

本書論述內涵宏大，整理其特色，概略有二。第一、史料上，本書廣泛使用日本外務省及軍方的檔案史料，如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史料、國立國會圖書館圖書、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微卷、美國國家檔案和紀錄管理局檔案等，並大量運用已出版原始材料，如《大本營陸軍部戰爭指導班：機密戰爭日誌》。由於日本戰敗後，有選擇地燒毀外交、軍事檔案，以求有利於美國主導的審判，作者乃盡力蒐羅所餘機密檔案，這些檔案當時看起來「無害」，因而未被銷毀。藉由這些檔案及參酌為數不少之時人評論，作者重新論述當時日本領導人的地緣政治思考和戰略。

第二、論點上，作者指出，戰後日本的歷史書寫，主導者有二，一為美國觀念的「太平洋戰爭書寫」，強調日本不該發動對美戰爭，此說並散播於一般大眾；二為學院派受馬克思主義及自由派影響的「亞洲戰爭」敘述，強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罪行。兩種歷史書寫，都忽略了日本的歐亞——太平洋戰爭脈

絡和蘇聯的角色。作者認爲，蘇聯加入戰爭之後，日本懼美、蘇報復，銷毀關於歐亞——太平洋戰爭計畫的檔案，將自己裝扮成可憐且缺乏判斷力、僅乞求蘇聯調停戰爭的模樣，於是蘇聯參戰之後，日本領導人假裝感到非常驚訝，對外表現被蘇聯背叛的樣子，就此形成一套官方說法。美國佔領日本之後，也通過命令，抹消戰爭中蘇聯因素或日本的歐亞戰略，禁用「大東亞戰爭」這種排斥白人的稱呼。美、蘇日後交惡，更使美方致力清除戰爭的歐亞層面。美國讓日本加入其陣營的國際社會，使日本離蘇聯、中國、朝鮮更遠，親美學者賴世和（Edwin Reischauer），且使太平洋戰爭的論述更爲成熟，讚揚美國幫助下日本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，掩蓋了明治維新以來，日本受到蘇聯文化和思想的影響（頁 268-275）。作者這樣獨特的觀察角度，重述日本的戰略，建立「歐亞——太平洋戰爭」脈絡，注意戰爭的地緣因素，突出蘇聯的作用，頗能修正過去過於重視美國的「太平洋戰爭」直線歷史敘事，突破「勝利者的歷史」之既有論點。像是過去關於原子彈作用之詮釋，以此爲日本投降之關鍵，本書則不斷強調日本投降，關鍵因素其實是蘇聯參戰。作者這樣的論點，在近年的學術專書，已有相似看法，如：長谷川毅（Tsuyoshi Hasegawa），*Racing the Enemy: Stalin, Truman,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* (Cambridge, Mass.: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); Michael D. Gordin, *Five Days in August: How World War II Became a Nuclear War* (Princeton, N. 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7), 足見所言於學界，已有相當基礎。

四

本書特色顯著，惟所論似仍有可討論之處。首先，日本是否有如此長期且一貫的歐亞——太平洋戰略？誠然，日本對蘇聯相當重視，而這在過往許多著作中已經呈現，非作者最早提出。惟吾人亦知曉，日本政府受軍方或現地軍的影響，難有連貫策略；即便軍方本身，陸、海軍亦路線不同。因此，論者對於日本對華戰爭，往往認爲日本最大的問題，就是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。作者花

了相當篇幅，利用許多民間刊物或時人說法，來論證日本政府有歐亞的宏大戰略。此雖爲作者刻意爲之（頁 7），但民間的說法，是否代表政府決策高層的實際考量？本書對這中間的聯結，似稍不足。此外，由於日本大量毀燒相關檔案，吾人已難確知政府決策過程的許多考量細節。實則政治運作過程，極其複雜，不但牽涉作者強調的國家整體戰略，也牽涉許多派系利益、人事糾葛，中間有許多偶然因素。在史料不足的狀況下，作者作這樣大的概括，基礎似乎有些薄弱，有以論帶史之感。

再者，本書除了突出蘇聯在日本戰略思考中的地位，對於朝鮮、滿洲、中共亦以相當篇幅作論述，但對於日本另一重要殖民地臺灣及重要戰爭對象國民政府，論述卻極其欠缺，鮮少利用中文材料；既然作者欲突顯日本的亞洲大陸觀念，惟略去臺灣及國民政府，似乎有所缺憾。

綜而言之，本書重新爬梳史料，提出一套新的歷史脈絡，解釋戰爭結束前日本的亞洲戰略，於重新檢討既有假設、勇於提出新論點及史學反省等層面，皆甚值得參閱。